

普适理论、中国情景与管理实践

□ Dean Xu (许德音)^①

摘要：Shenkar (2017) 建议在普适性与独特性、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应采取一个“混合型的研究模式”。我对这一模式持支持的态度，但是并不认为这一途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学者们发展管理理论时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同时，对于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即理论研究和实践之间的取舍，我的观点是商学院的导向不应该建立在实用主义原则上。

关键词：普适性；中国情景；中国管理学研究；管理实践

Oded Shenkar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Shenkar, 2017) 一文对涉及“中国管理”的一系列问题做了一个简洁的归纳，也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所持的立场是“混合型的研究模式”，即从中国的独特性出发，以发展情景化的组织理论和管理模式作为研究的最终目的。对于这个立场，我是一个支持者，但并非坚定的信仰者，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Oded 是国际管理学界的著名学者。虽然他的主要成就并非中国研究，却是由中国研究出身，这在非华裔背景的国际管理学界十分罕见。他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的合作者——我们开始合作时并未见过面。那是 2000 年底，我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作应聘访问，当时正在帮助光华做招聘工作的 Anne Tsui (徐淑英教授) 听说我有一篇关于“制度距离”的论文在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进入了“Revise and Resubmit”（修改后再投稿）的阶段却遇到一些困难，就建议由她把论文发给 Oded，看看有没有可能合作，因为 Oded 当时刚好有一篇评论“文化距离”的论文被接受 (Shenkar, 2002；该文后来获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的 Decade Award 奖)。我和 Oded 由此认识，并通过 E-mail 成功修改了那篇论文 (Xu & Shenkar, 2002)。我记得后来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他最初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在转向管理学研究之前的志向是在 *China Quarterly* 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

^① Dean Xu (许德音), Monash (蒙纳士) 大学商学院。

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六年，后来虽然到香港大学去了三年，但随后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待了三年，直到 2013 年离开中国去墨尔本大学。我的这段经历，使我对 Shenkar（2017）一文所讨论的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具体说就是，我们都清楚地看到关于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在国际管理学刊物上迅速增长。Oded 在他的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数据，我这里也有一些相关的数字。我和我的一位同事对 2001~2010 年国际管理学界在 8 个最主要的管理学期刊^①上发表的有关新兴市场企业战略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发表在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上（Xu & Meyer, 2013）。表 1 是基于其中有关的文献统计。可以看到，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有关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战略的研究已经是新兴市场企业战略研究中最大的热点，占这一领域论文总量的一半（122 篇），而且远远甩开了排在第二位的印度（18 篇）；其中后五年的研究数量（72 篇）又比前五年（50 篇）增长了 44%（Xu & Meyer, 2013）。这些数据直接反映了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日益上升的地位，以及与此相应的中国管理研究的兴起。

表 1 2001~2010 年有关论文的数量

	涉及中国市场或中国 企业战略的论文数（篇）	涉及印度市场或印度 企业战略的论文数（篇）	有关新兴市场 企业战略的论文总数（篇）
2001~2005 年	50	5	99
2006~2010 年	72	14	161
全部	122	18	260

资料来源：Xu 和 Meyer, 2013。

从个人的体验来说，十几年前我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有关中国企业管理的文献，可以用十个手指数出主要研究者的人数来^②；但在过去十几年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有资深教授，也有新鲜出炉的博士毕业生——完全或部分地投入到中国企业的研究上，成为一个快速增长的学术群体，近一两年来（与过去相比）更是达到井喷的程度。大批以中国企

业和中国管理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涌现出来并在国际知名的商学院获得终身或终身轨的教职。

然而，大家对于中国管理学研究在国际管理学研究体系中的作用和定位，依然不能形成一个一致的看法。在中国期间，我对中国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个人的学术发展和中国管理学领域的前景曾经努力地作过一些思考，散见于我历年所写的一些文章中。2004 年初，我发表

① 这 8 家期刊分别为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ournal of Management*、*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Organization Scienc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② 达拉斯德州大学的 Mike Peng 教授曾经在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上撰文回忆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刚刚开始进行中国问题研究时的“孤独”：从他的导师到同事，没有人看好他的努力；但今天他已经是转型经济与制度理论的重要贡献者之一。

的《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现状评估》一文（许德音和周长辉，2004），可以说是第一次对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的状况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评估。2005年，我发表了《“中国式管理”还未通过检验》（许德音，2005）。2007年我离开北京大学后，又在国内报纸上发表了几篇为“海归”们提供建议的文章，后来应邀把里面的主要思想改写成英文，发表在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上，成为不多见的基于个人经历而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的文章之一（Xu，2009）。这些文章反映出我作为一个接受了西方管理理论教育却又希望为解决中国的独特现象作出贡献的“海归”学者所面临的两难境地。这种两难不但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也反映在对个人能力的投入以及对国内、国外就业院校的选择上。

多年后的今天，Shenkar（2017）促使我对普适性和独特性、“在中国的管理”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这些长期以来的争论焦点再作审视。我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在 Oded 的文章中被说成是屡见不鲜的）2 乘 2 表格中，如表 2 所示。

表 2 一个简单的理论情景 2×2 表格

	西方情景	中国情景
独特理论	只适用于西方的 管理理论	只适用于中国的 管理理论
普适理论	在西方情景下发展 出来的普适理论	在中国情景下发展 出来的普适理论

在表 2 的四个象限中，左上象限是国际管理学界的主流，却被有识之士（包括 Oded）所诟病，因为这些理论被广泛应用到有关中国管理的研究中，但实际上在中国情景中经常并不适用。右上象限显然不能被国际主流学界所接受，因为缺乏普适性（虽然我们总是委屈地争辩：左上象限里的那些研究也缺乏普适性）。左下象限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赖以获得学术成就的通途：大多数中国学者所进行的研究都是以左上的西方理论为起点向左下发展，试图将这些理论在中国情景中加以验证和补充，使之发展成“普适”的理论。只是学术界领袖们并不满意（Shenkar，2017；Tsui，2004），其中至少有一个理由是，许多中国特有的现象，并不存在相应的西方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所以光靠这样的理论发展，必然导致许多中国的管理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而右下象限则（对中国管理的研究者而言）代表了一条比较理想的道路，是像 Oded Shenkar 和 Anne Tsui^① 这些领袖人物，也包括很多国内学者，想要推动的方向。只是知易行难，Oded 自己也认为“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

我个人认为其中的一个难题是：如果在西方情景下发展出来的“普适理论”被认为是不完善的，那么同样地，怎么能断定在中国情景下可以发展出完善的普适理论呢？而且，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如果只有在中国情景下发展出来的理论才能指导中国情景下的管理，那么在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我们应该用在

① Anne 曾把她在《经济观察报》上的一篇记者采访和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相关文章电邮给我。她的主要观点是，虽然中国管理研究已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她对这些研究并不满意，因为它们还没有找到中国管理的特征。

什么情景下发展出来的理论，去应用于在中国的西方企业、在西方的中国企业，或者在任何国家的中—西合资企业呢？当然由中国情景中发展出来的理论可以填补现存管理学理论体系中的空缺、促进理论创新（李海洋和张燕，2016）（这是我支持这条道路的理由），但它似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面临的普适——独特的两难境地（这是我立场“不坚定”的原因）。也许一个真正能包容各国独特性的普适理论并不存在，或者只能以 Oded 所谓的极简洁的（extremely parsimonious）形式存在？但进一步去想，如果没有一个普适的管理理论，而只能在独特的情景里应用独特的理论（也就是右上象限），那理论又有什么用处呢？因为如果那样，并且做到极致的话，我们对在每一个国家里的每一个具体管理问题都得发展出独特的理论，那其实就等同于对每一个管理问题都得做案例分析了。这些问题，似乎不是能够随着研究中国管理问题的学者队伍壮大、国际主流学术刊物对中国研究的接受程度提高，就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的。

与此相关而又长期困扰国际和国内管理学界的另一个话题是：究竟商学院的学术活动应该以理论研究为主，还是以实践知识为重？之所以说这和上面所谈的问题是相关的，是因为在我看来，实践知识就是极致情境化了的“理论”。我们不把实践知识称为理论，因为我们都知道理论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普适性）；但是当抽象和概括的理论被不断地具体化、情境化后，它实际上就成了我们的实践知识，所

以普适的理论、情境化了的理论、实践知识这三者可以被视为是在同一条维度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界线取决于我们把理论情境化到何种地步。

对学者来说，我们在这条维度上的定位本来似乎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大学师资由受过博士训练的学者组成；我读博士的时候，只被告知要学会独立从事科学研究、要为管理学（注意，也没有“美国的”或“中国的”这样的前缀）理论做出贡献；这是我获得管理学领域哲学博士学位的唯一要求。然而在我选择从事中国管理研究之后，因为涉及情境化的理论，这个问题开始变得微妙。尽管如此，我的底线肯定是在理论一边。但是在社会上，甚至在商学院内部，人们对于商学院教师似乎经常采用一个不同于对其他学者的标准，要求我们放弃理论研究而变身为实践型的专家。我个人一向反感这样的要求，因为，首先，这不符合我进入学术行业的初衷。大学就应该是“象牙塔”，而我就是喜欢待在“象牙塔”里^①，只恨自己没能上到塔的更高层。喜欢实践的人，就不应该待在学校，而应该去企业。其次，我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普适的理论—情境化的理论—管理实践这条维度上，我可以在前两者之间徘徊，却不能够无底线地向实践靠拢。我们接受的是特定的学术训练；我们的使命是创造管理知识、传播管理知识。至于能不能用这些知识去赚钱，那要看管理实践者们的能力和造化了。

① 当代最优秀的管理学家之一马奇（James March）教授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有一次他在管理学学会做演讲时开玩笑地说，他从五岁进入第一个学校（学前班）后，就爱上了学校，从此再也不愿意出来。大家听了，会心一笑。

当然，更“正确”的说法是发展理论与事实实践并不矛盾，但我总觉得那只是外行们想当然而已。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和特殊技能是有限的，很难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同时取得竞争优势。我不否认参与实践可能对发展理论有帮助，但这些活动也使人精力分散，影响专注程度，而且个人的实践和个人的理论贡献之间，并不需要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像爱因斯坦不需要会造火箭和原子弹一样。在这方面，我们很多人是被从小所受的一些带有误导性的哲学观念影响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管理学理论贡献，是通过理论推导和科学的数据采集、分析完成的，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实践经验”得来的。那种认为只有经过自身的管理实践才能发展管理理论的想法并没有根据。正如一位前辈学者指出的，想要研究猴子，我们不需要变成猴子，并且和它们一起跑、一起跳；只要仔细观察，我们一样能够了解猴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对“实践”的过分重视可能是国内商学院学者所面临的误区之一。商学院以外的其他学科也同样，都表现得过于“入世”。比如当初要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就有一大群经济学家“重上莫干山，激辩经改”，对非学术性事务如此热衷，为国际学术界所罕见。而学者太“入世”，不论是其本身的行为还是所研究的内容太具功利性，就丧失了学者应有的特殊地位。我不是贬低实践者；但是术业有专攻，我们的专业在学术上。过去学术是为政治服务，当然也就没有真正的学术；现在学术又经常屈服于经济压力，与学术研究的初衷相悖。比如商学院常见的是“实践型”的教授常年跑企业，做咨询、写案例。做咨询

项目虽然对了解企业有帮助，但绝非商学院教授的主业，也不要天真到以为自己会比咨询公司更高明。至于案例，看看我们国内院校写出来的案例，有多少不是在企业的压力下写成了另类的歌功颂德？比较而言，那些做理论研究、统计分析的同事，就更少受到“污染”，更加客观和独立。

我写这些话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褒贬同行；我想表达的是，国内商学院对理论研究，包括情景化理论研究的重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对于向国际学术标准靠拢，不是做得太快，而是做得太慢。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中国企业）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这本来是我们的大好机遇；但理当属于我们的奶酪却大半被竞争对手（海外学术机构）享用了。这正如我们在考察企业时经常看到的：市场快速增长对行业内现有的、满足于增长的玩家来说未必是好事，因为本来在门外的庞然大物被吸引了进来。可惜的是，很多学校被 MBA、EMBA 收入大幅增加这样的“大好形势”所迷惑，忘记了自己作为学术机构的安身立命之本。另外，博士教育和学术论文，属于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产业，与中国现阶段的“时代精神”并不相符。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外已经成名的学者，回国后很少能有在学术上继续发扬光大的，大多是一转身就成了行政官僚。

除了社会文化环境外，学术制度环境对研究活动的影响也十分重要。现在除了北大和清华采用类似于北美的终身制和终身轨教职外，其他商学院反而在“打破铁饭碗”。要知道大学的终身制度是为保护学术自由、鼓励长期研究投入而设立的。没了“铁饭碗”的教授们可能就只能看领

导和企业的脸色去做研究了。这样的“研究”当然是实用主义的而不可能是理论性的。

我经常听到的一种反对理论性研究的观点是，中国学者应该为中国的管理实践做出贡献，而不是为外国的管理理论做贡献。这种观点否定西方的和普适的管理学理论（表 2 中左上、左下和右下三个象限）的重要性，而只偏重为中国管理实践服务的理论（右上象限）。这样的态度，只会妨碍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因为后一类（右上象限）的研究一般只能在中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而事实是，不但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至今还未见中国学术界的贡献；就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又有哪些是在国内学术界提出而被广泛接受的？别的不说，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一些关于“关系”的理论“比如关系是对制度缺失的一种弥补”（Xin & Pearce, 1996）和实证结果“比如关系和业绩之间的权变关系”（Peng & Luo, 2000），有哪些不是“国外”学术界提出而让我们思路大开的？

我之所以赞成 Shenkar（2017）倡议的混合型模式，是因为他（以及李海洋和张燕，2016；Tsui, 2004）是以补充、丰富和创新（普适的）理论为目标。这样的模式兼顾了我们作为管理学者应有的立场和作为中国学者特殊的定位。争论还会持续，两难的处境还会困扰我们，但至少，在国际学术界，我们是处在一个对中国管理研究十分有利的时代，有条件根据我们的理想和优势做出自己的选择。

（接受编辑：李海洋

收稿日期：2017 年 4 月 21 日

接受日期：2017 年 4 月 23 日）

参考文献

- [1] 李海洋、张燕：《情境化知识与普适化理论的有机结合——探索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之道》，《管理学季刊》，2016 年第 4 期。
- [2] 许德音：《“中国式管理”还未通过检验》，《21 世纪商业评论》，2005 年第 13 期。
- [3] 许德音、周长辉：《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现状评估》，《管理世界》，2004 年第 5 期。
- [4] Shenkar, O.: 《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管理学季刊》，2017 年第 1 期。
- [5] Peng, M. W., & Luo, Y. 2000.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n emerging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 - macro lin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3), 486-501.
- [6] Shenkar, O. 2012. Cultural distance revisited: Towards a more rigorous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2 (3), 519-535.
- [7] Tsui, A. S. 2004. Contributing to global management knowledge: A case for high quality indigenous research.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1, 491-513.
- [8] Xin, K., & Pearce, J. 1996. Guanxi: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9, 1641-1658.
- [9] Xu, D. 2009.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cademic returnees in China. *Asia Academy of Management*, 26, 27-35.
- [10] Xu, D., & Meyer, K. E. 2013. Linking theory and context: ‘Strategy research in emerging economies’ after Wright et al. (2005).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0 (7), 1322-1346.
- [11] Xu, D., & Shenkar, O. 2002.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7 (4), 608-618.